

王彬, 孙懿, 刘云刚, 等.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霍尔果斯边境口岸空间转型过程及其机制 [J]. 地理科学, 2024, 44(2): 258-267. [Wang Bin, Sun Ao, Liu Yungang et al.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Khorgos border po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or-Network Theor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4, 44(2): 258-267.] doi: 10.13249/j.cnki.sgs.20221533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霍尔果斯边境口岸 空间转型过程及其机制

王彬¹, 孙懿^{2,3}, 刘云刚^{2,3}, 吴殿廷⁴

(1.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2.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亚洲地理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31;
3. 华南师范大学行政区划与空间治理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31; 4.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北京 100875)

摘要: 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 以霍尔果斯口岸为案例地, 对比不同时期边境口岸空间转型的过程特征, 并剖析其背后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 ① 多元异质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诉求前提下围绕阶段性的共同目标连接起来, 从而推动边境口岸行动者网络的建构与重构。② 新时期边境口岸行动者的构成、意图和目标发生改变, 且行动者网络从松散状态转变为紧密状态。行政权力主体调动市场资本和社会大众力量参与其中并共同推动边境口岸空间转型发展。本研究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边境口岸建设及其与“一带一路”倡议有效衔接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边境口岸; 空间转型; 行动者网络理论; 霍尔果斯

中图分类号: K9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24)02-0258-10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 边境口岸空间转型成为当前国家面临的区域发展问题之一^[1-3]。第一, 边境口岸是国家(地区)间贸易往来和社会文化交流的通道, 是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节点。第二, 边境口岸作为特殊的空间组织形式, 其转型发展具有兴边富民和稳边固边的重大意义^[4]。第三, 边境口岸承载着一系列特殊经济功能区, 如海关特殊监管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及综合保税区等, 国家以此培育其成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和跨境合作的新平台^[5-7]。因此, 研究新时期边境口岸空间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边境口岸空间转型是多尺度多主体共同参与而形成的关系聚合体, 其背后是行动者网络变化的结果。在边境口岸建设和发展过程中, 各类行动主体的目标、实践及其关系对空间塑造和重构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一过程中, 哪些行动主体处在行动者网络的核心和边缘地位, 他们是如何影响边境口岸

空间塑造; 随着时间的推移, 哪些行动主体进入或退出, 行动者网络又发生怎样的重组过程, 都是需要进一步明晰的问题。

鉴于此, 本研究选取霍尔果斯边境口岸作为典型样本, 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 剖析其空间转型过程与形成机制。首先, 识别边境口岸内外部各类行动主体, 厘清其角色、目标、行动及其特征。其次, 分析边境贸易阶段和地缘合作阶段的行动者转译过程。最后, 对比分析行动者网络的改变和存在的问题。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边境口岸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 从而推动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对接。

1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边境口岸空间转型的分析框架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是20世纪80年代由法国社会学家卡龙(Michel Callon)和拉图尔(Bruno Latour)为代表的科学知识

收稿日期: 2022-12-15; 修订日期: 2023-07-1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30705)、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2XM2008)资助。[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2230705), Soochow University Funding Project of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2XM2008).]

作者简介: 王彬(1989—), 男, 回族, 山东青州人, 讲师, 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旅游与文化地理。E-mail: bwang01@suda.edu.cn

通信作者: 刘云刚。E-mail: ygliu@scnu.edu.cn

社会学家提出来的。这一理论将非人类因素和人类因素重新连接起来,弥补了自然和社会之间所造成的鸿沟^[8-10]。行动者网络的结构是拓扑的、非线性、非层级化和分散化的。该理论打破了原有的包含式、层级式和嵌套式的尺度形式,最终构成一个有序运转的系统^[11]。可见,行动者网络中的各类主体都是在相互博弈中寻求发展的空间,以达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目的。这一理论被应用于城乡地理^[12-14]、经济地理^[15]、旅游地理^[16-17]及文化地理^[18]等领域,然而政治地理或地缘政治学科背景下边境口岸行动者网络却疏于梳理。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行动者网络也存在一种尺度,并能够通过各个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体现尺度间的复杂关系。这与王丰龙等在探究尺度认识论时提出的网络尺度结构不谋而合^[19]。

基于此视角,边境口岸的空间转型被看作是行动者网络演化过程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多元异质主体的构成、目标、问题和利益诉求发生着改变,并统一于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之中。经过转译过程,多元异质主体问题和利益得以呈现,集体共识得以形成,从而促进边境口岸的空间转型。因此,借助这一理论解析边境口岸空间转型过程及其背后的形成机制是合理且适用的。

具体操作如下:第一步,划分发展阶段。识别边境口岸空间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是行动者网络研究的前提。第二步,识别多元行动者。鉴于行动者的多元异质性特征,大致可将边境口岸的行动者划分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第三步,剖析行动者网络的转译过程。转译过程就是行动者网络的构建过程。① 问题呈现是核心行动者将当前口岸发展的目标问题化,从而促使各类行动者共同关注同一问题,即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OPP),并指出各类行动者的发展目标、阻碍和问题。② 利益赋予是行动者之间通过共同利益纽带联系起来,共同推动其建设和发展。③ 征召是核心行动者组织和引导其他行动者参与口岸建设,形成了一个征召的网络,每个行动者都必须被赋予可接受的任务。④ 动员是核心行动者动员其他行动者参与项目的开发与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核心行动者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而成为代言人,其他行动者参与并成为成员,最终结成网络联盟。⑤ 异议是诸多行动者之间因为目标、利益和问题的差异存在着多处问题。因此,需要排除异议达成利益共识。最后,对比不同发展阶段行动者网络变化可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并进一

步提出优化路径。

2 研究区及调研概况

2.1 研究区概况

霍尔果斯口岸地处欧亚大陆桥的咽喉要道,位于亚欧经济板块和亚太经济板块的中心节点,是新疆乃至西北最大的国家一类陆路开放口岸。霍尔果斯口岸最早于 1881 年正式通关,后因中苏关系关闭,而于 1983 年重新开放。中国、哈萨克斯坦两国于 2003 年达成建设中国、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简称“中哈合作中心”)的共识,2005 年签署协定,2012 年正式封关运营,总面积 5.6 km²(中方区 3.43 km²,哈方区 2.17 km²)。2010 年 5 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决定设立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总面积 73 km²。2014 年 6 月 26 日经国务院批复设立霍尔果斯市,辖区面积为 1 908.55 km²^[20]。纵观历史发现,从中哈合作中心构想提出开始,霍尔果斯口岸进入迅速发展的快车道。鉴于此,将其转型发展大致分为 2 个阶段,即边民互市主导的边境贸易时期和跨境自由贸易区主导的地缘合作时期。特别是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的对接,霍尔果斯口岸成为中国、哈萨克斯坦两国地缘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21],是一座集商贸洽谈、保税物流、落地加工、离岸金融和旅游购物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口岸城市。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调研阶段:第一阶段,2015—2017 年对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等多地开展实地调研,初步形成对边境口岸发展的基本认识。第二阶段,2020 年 9 月 24 日至 10 月 10 日对霍尔果斯开展深度调研。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法和话语分析法。期间每位访谈者访谈时间 10~60 min,最终获得上万字文本资料。访谈对象主要为居民、游客、经营者和政府人员,共 21 人(表 1)。

3 边境行动者构成与转译过程

3.1 边境行动者的构成

霍尔果斯边境口岸的多元异质行动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权力主体、市场资本主体和社会大众主体,还包括非人类行动主体。① 行政权力主体:第一,中央政府、自治区、自治州和市政府是边境口岸转型发展的关键力量。第二,霍尔果斯海关隶属于乌鲁木齐海关管辖,承担口岸及市域范围内的一

表 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Table 1 Attributes of the interviewees

	编码	访谈位置	性别	年龄	职业	访谈重点
居民	R1	滨河北路卡拉苏河亚欧新 天地小区门面房	男	50+	工程老板	生产生计过程与策略、社会 联系网络、跨境经营关系、 政策感知、迁移与定居、社 会空间变迁等
	R2	亚欧北路	女	45+	餐饮店员工	
	R3	亚欧北路	男	45+	餐饮店老板	
	R4	中哈合作中心	男	45+	合作区内司机	
	R5	亚欧北路	女	40+	杂货店老板	
	R6	亚欧大道-老国门	女	30+	国门员工	
	R7	霍尔果斯口岸老国门	男	28+	国家电网员工	
	R8	霍尔果斯口岸老国门	女	40+	非正规经济从业人员	
	R9	霍尔果斯口岸老国门	女	30+	国门景区解说	
游客	T1	城南工业园行影旅行	男	35+	游客	边境旅游的动机、态度、行 为、满意度及重游意愿等
	T2	霍尔果斯口岸老国门	男	25+	游客	
经营者	M1	城南工业园行影旅行	男	35+	个体户(旅游公司)	销售商品特征、销售渠道和 消费群体; 地缘环境及政策 对销售经营的影响等
	M2	城南工业园行影旅行	男	35+	个体户(旅游公司)	
	M3	伊宁市企业园	女	45+	个体户(福建)	
	M4	中哈合作中心	女	30+	日韩免税店销售员	
	M5	中哈合作中心	女	30+	日韩免税店销售员	
	M6	欧亚大陆-老国门	女	45+	个体户-非正规经济	
	M7	霍尔果斯全季酒店	女	40+	合作中心个体户	
政府人员	G1	霍尔果斯人民政府	女	40+	副处级干部	地方发展状况与问题、地缘 环境及国家政策的影响、未 来发展规划等
	G2	霍尔果斯人民政府	男	35+	正科级干部	
	G3	霍尔果斯大数据产业园	男	28+	科员	

切进出口货物及人员的管理工作。第三,霍尔果斯口岸管理委员会是伊犁州党委和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行使自治区级的管理权。第四,边防部队负责查处违边案件、抓获外逃人员、破获刑事案件、堵截和查出违规越境人员。② 市场资本主体:第一,大型投资企业。中哈合作中心内部进驻一批规模大型且实力强劲的企业,包括房地产业、商务服务业等。第二,中小型企业。老城区聚集着批发零售、租赁和商务服务、影视传媒等企业。配套区聚集着轻纺针织、新型建材、食品加工、塑料制品和皮革加工等轻工业企业。第三,个体商户。既有大宗商品经营和外贸货代的商人,又有小商品销售的群体。③ 社会大众主体:第一,当地居民。霍尔果斯口岸吸引来自 61 和 62 兵团及周边乡镇的居民进城定居、经商或者务工^[22]。第二,外来人员。除户籍人口外,外来人口占比较大,即来口岸经商、务工、运输、行政和外贸等行业的工作人员。第三,旅游者。霍尔果斯口岸长期吸引着国内外旅游者前来购物以及观光。④ 非人类行动者:中哈合作中心、老城区和配套区

三大功能区块作为非人类行动者,与人类行动者具有对等的地位,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统一于边境口岸行动者网络之中。

3.2 行动者转译过程

霍尔果斯边境口岸行动者网络转译经过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和异议环节得以建立,而边境贸易时期(图 1)和地缘合作时期(图 2)的转移过程具有差异性^[23-25]。

1) 边境贸易时期的转译过程。① 问题呈现:20 世纪 80 年代霍尔果斯口岸重新开放后,霍城县商业局贸易中心挂靠伊犁州经贸公司,与潘菲洛夫区签订易货合同,参与边境贸易。同时制定了边贸兴县战略,向上级申请边贸进出口权,建立边民互市贸易市场。因此,当前各类行动主体聚焦到一个问题是“如何开展边境贸易”(图 1)。② 利益赋予:这一阶段的利益赋予主要得益于中国、(前)苏联关系改善后霍尔果斯口岸重新开放。边界中介效应的实现吸引了新疆各地、江浙一带的商人纷纷前来,同时中小企业在口岸及兵团区建立工厂,往境外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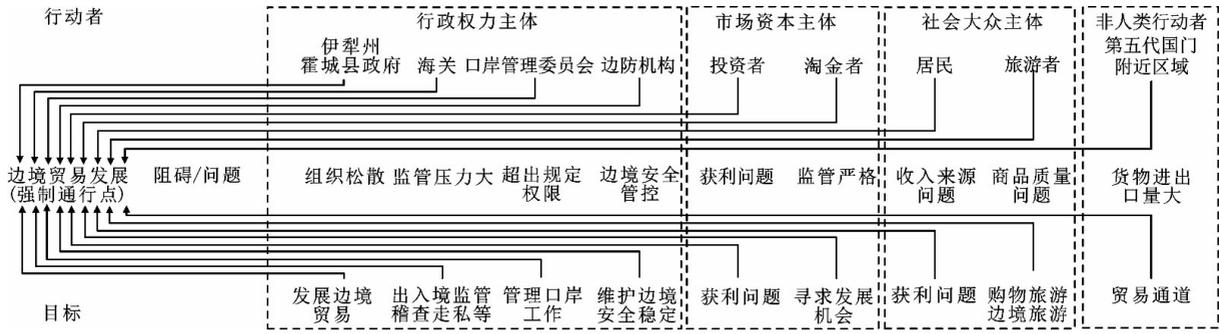


图 1 边境贸易时期的边境口岸行动者目标、问题及未来发展路径

Fig.1 Goals, issues and future paths of border port actors in the period of border trade



图 2 地缘合作时期的边境行动者目标、问题及未来发展路径

Fig.2 Goals, issues and future paths of border port actors in the period of geo-cooperation

售商品。③ 征召和动员: 这一阶段口岸管理委员会是边境口岸的核心行动者, 为自治州派出机构并实行自治区授权的县级政府职权。它通过规划未来发展方向和制定相应政策以塑造营商环境,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到口岸开设销售点, 从而促使形成的征召网络。同时, 经过动员环节, 在苏联解体后霍尔果斯口岸形成了民间贸易小高潮, 中亚各国商人纷纷到口岸购物, 双方交流密切。④ 异议: 这一阶段口岸管理委员会管理职能远远超出国家赋予的权力范围, 除了负责管理协调之外, 还承担地方政府的行政职权和责任。但作为自治州派出机构且并非一级政府, 缺乏相应的管理权限。随着边境口岸经济活动的加强, 边境维稳和进出口安全成为摆在边境管理机构面前的重要任务。此时, 多元行动主体逐渐参加到行动者网络中来, 但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和中国、哈萨克斯坦两国的发展需求, 霍尔果斯边境口岸行动者网络处在比较松散的阶段。

2) 地缘合作时期的转译过程。① 问题呈现: 中国、哈萨克斯坦两国于 2004 年 9 月 20 日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建

立“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框架协议》(http://cja40.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bjhysws_674671/bhgjty/kagly/202303/P020230320561916228834.pdf), 2005 年 7 月 4 日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活动管理的协定》(http://svideo.mfa.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bjhysws_674671/bhgjty/kagly/202303/P020230320561653102289.pdf), 以此作为两国建设、管理和运营中哈合作中心的纲领性文件。此后, 霍尔果斯叠加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经济开发区和跨境金融发展区等多重功能区, 并在土地、贸易、投资和财税等方面享受多项优惠政策。当前问题呈现聚焦到“如何参与边境口岸的开发与建设”, 多元异质主体均有着自身的发展目标、问题和利益诉求, 最终通过达成共识建立新的行动者网络(图 2)。② 利益赋予: 此阶段随着边界效应的进一步转化, 边境口岸被赋予了多重利益。第一, 促进地方发展是当地行政部门的主要目标, 即通过招商引资、提供廉价土地和配套服务等措施, 增加财政收

3) 社会大众主体的边境贸易和购物旅游。边境口岸的居民较少,外来人口主要是运输货物的暂停客商和边境购物的旅游者。一方面,当地居民主要与哈方边民的开展边境贸易,为往来车辆提供简单维修及为司机提供日常食宿服务等。另一方面,受边民互市的影响,旅游者和旅游团多来自中亚和独联体国家(地区),他们前来的主要目的是进入边民互市贸易区或国门附近从事商品交换和买卖。

4) 国门附近的人员和货物聚集。第一,第五代国门附近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等待出境的货车以及世界各地旅游购物的游客。二是,20世纪80年代边境贸易主要聚集在第五代国门附近。随着90年代边民互市区的设立,边境贸易向青年街市场、货大市场和天马市场等边贸市场聚集。后因城市拓展和土地调整,原有的边民互市区被改为行政服务大厅和城市规划馆。21世纪初在第五代国门附近又出现边贸市场,之后便转移到中哈合作中心内部。

4.2 地缘合作时期的行动者网络重构

在地缘政治经济合作深化的背景下,霍尔果斯口岸的行动者网络发生着变化,内外部的多元异质主体参与到口岸的建设中来,从而推动了边境口岸空间转型。

1) 行政权力主体的设想与实践。行政权力主体改变着原有的行动者网络,是新行动者网络的主导因素。第一,口岸口岸管理委员是征召过程中的核心引导者。中国、哈萨克斯坦合作中心的设想最初是由口岸管理委员会提出来的,且这一想法得到阿拉木图州第一州长的认可并上报哈方总统同意。因此,口岸管理委员会在推动两国地缘合作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自治区和自治州通过“一个机构、三块牌子”的方式对口岸管理机构进行重组,明确其在口岸开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中央政府是中国、哈萨克斯坦合作中心的战略领导者,特别是两国领导人从高层推动了中国、哈萨克斯坦合作中的开发建设。2004年5月商务部完成《关于建立中哈霍尔果斯边境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经过专家论证并与哈方经过多轮协商,最终采纳哈方方案,即在双方接壤较小范围内建立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此后,中国、哈萨克斯坦两国又签订了《关于建立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框架协议》以及《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活动管理的协定》。第三,各级政府与机构是霍尔果斯口岸发展的共同践行者。自治区政府为中方主要授权单位;

工业和贸易部为哈方主要授权单位。中国的商务部和自治区政府在中国、哈萨克斯坦合作中心建设和运营以来多次与哈方工业和贸易部及其相关部门、企业开展磋商。同时,中国商务部通过与中哈经贸合作分委会协商成立边境合作中心协调小组,而自治区政府成立边境合作中心建设领导小组^[27]。霍尔果斯市政府是为解决口岸发展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成立的,通过规划和优惠政策的出台吸引大批企业和外来经营者前来投资。同时,地方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并开展具体的协作管理。第四,苏州工业园区在2016年就与霍尔果斯开展精准对口帮扶。一方面,援疆工作组将产业招商、园区建设和保税区经验等“苏州理念”应用到霍尔果斯口岸。另一方面,霍尔果斯也定期组织人员赴苏州参加培训、业务研讨和顶岗实习等。这种双向互动交流对霍尔果斯口岸空间转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此外,霍尔果斯海关和边防机构在维护边境安全方面仍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图4)。

2) 市场资本主体的介入和投资。多元市场资本主体的加入成为行动者网络中最活跃因子。第一,霍尔果斯开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有控股的公司主导边境口岸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为其他投资主体提供配套和相关服务。第二,随着国家、自治区和自治州一系列政策优惠的出台,霍尔果斯口岸吸引大批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前来投资。中国、哈萨克斯坦合作中心强大的聚集效应吸引了一大批实力强劲、规模大型和战略性为主的投资,这种投资一般是由实力相对较强的大公司和大企业,或由政府牵头或是与政府相关的企业进行。第三,外来企业和开发商借助边境口岸独特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制度优势前来建设工厂、投资房地产和注册公司等,促进了其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的完善,从而塑造着口岸的新型生产空间。第四,“淘金者”活跃着边境口岸资本市场,包括高金融资本主体参与免税店的建设与经营、小商品市场的经营、旅游景区的建设,也包括中等资本主体参与货物代理与销售,还包括小资本主体参与日常商品的销售与经营等。

3) 社会大众主体的参与。霍尔果斯口岸的社会大众主体主要以本地居民和旅游者为主。第一,本地居民是社会大众主体的核心力量。原有的居民积极适应口岸的转型发展,并依据市场条件和自身实力在口岸开展商品的销售和从事相应工作等。大量经商者前来逐利,有的落户成为霍尔果斯市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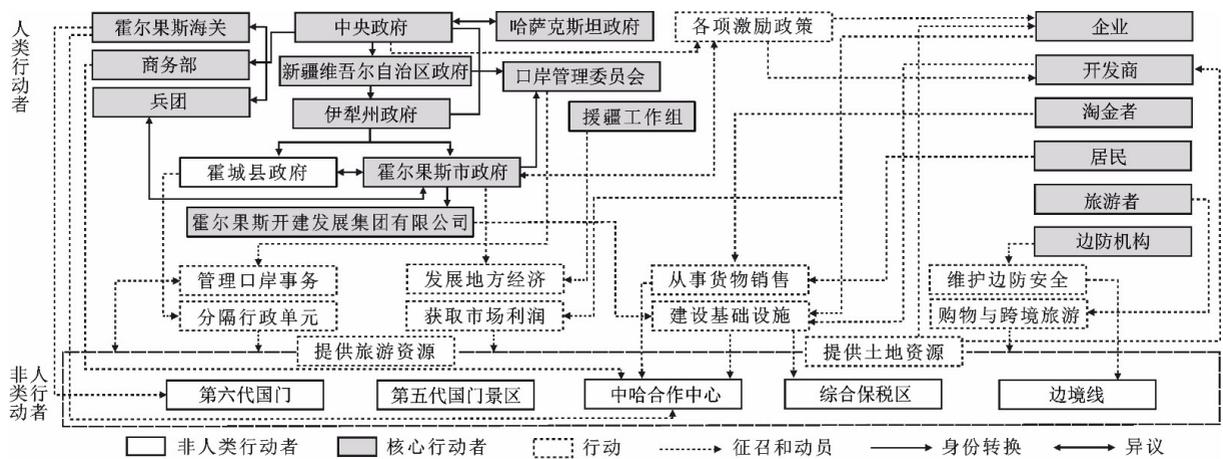


图4 地缘合作时期的边境口岸行动者网络

Fig.4 Border port actor network in the period of geo-cooperation

有的从事季节性的经营活动。第二,旅游者是社会大众主体的重要组成。入境旅游者来自中亚及东欧,最多是哈萨克斯坦,其次是俄罗斯,主要是到中国、哈萨克斯坦合作中心的特色商品零售店购物消费,或购置一定数量生活必需品,或开展大宗商品或金融交易等;疆内游客来自伊犁市及周边地区,其次是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和奎屯等,以免税购物为主;疆外游客来自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和广东等客源地,以观光休闲和旅游购物为主。

4) 沿边境线功能区块的形成。中方边境线一侧形成合作区、配套区和老城区三大空间且具有明确的功能定位。第一,中国、哈萨克斯坦合作中心吸引规模大和资本多的大型企业集团前来投资,主要通过建设酒店、娱乐设施、免税店和商品城等方式占据边境线的重要位置。第二,配套区的性质以海关监管货场为主,由海关负责管理。监管区范围内一切经济活动受霍尔果斯海关监督和管理。地方政府部门为铁路运输提供安保服务,如遇问题还需出面调解。第三,老城区发展为现代化服务和社会居住地区。此外,由于货物进出口量的增大和基础设施建设,第五代国门从货物进出口变为文化旅游展示区,货物进出区随之转移至第六代国门附近。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研究采用行动者网络视角,以霍尔果斯口岸为例,阐述中方一侧空间转型过程,明晰行动者的构成、转译过程及其行动者网络建构,以此探究其空间转型的机制^[28]。结论如下:

1) 边境口岸 2 个阶段的行动者转译过程存在着差别。第一阶段主要是受边境口岸重新开放影响,此时行动者网络是以口岸管理委员会为主要行动者,通过行政征召在边境贸易的强制通行点下转译凝聚各方利益行动者,将边境口岸打造成边境贸易的集聚点。第二阶段是受地缘政治经济合作深化的影响,此时行动者网络是以各级政府和口岸管理委员会为主要行动者,通过多种征召方式形成利益联盟,权力行动主体在口岸发展的强制通行点下通过转译凝聚各方异质行动主体,促使其成为多重功能叠加的边境口岸城镇。当各类行动者具有相同的利益诉求而围绕共同目标紧密连接时,行动者网络迅速组织,从而推动边境口岸的空间转型。

2) 边境口岸行动者的构成、意图和目标均发生了改变。第一,行政权力主体处在行动者网络的核心。与第一阶段相比,行政权力主体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资本投资。同时,国家、自治区和自治州将权力下放到霍尔果斯市政府,相关政府部门对边境口岸的发展负主要责任;口岸口岸管理委员会权力范围逐渐扩大,从自治州派出机构转变为自治区派出机构,但与地方政府存在管理职能的重叠和交叉。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对口援疆工作和苏州工业园区经验对霍尔果斯口岸的空间转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与第一阶段相比,大型企业和房地产商前来投资,逐渐占据边境主要发展空间。大量资本的介入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也带来了物价升高和房价抬高的影响。第三,多重优势叠加吸引着来自周边及世界各地的人群前来口岸。第四,非人类行动者因

区位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成为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实体, 成为权力重点治理区域和资本青睐对象。

3) 多元异质主体加入到霍尔果斯口岸的建设和发展中来, 在推动口岸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发展问题, 如口岸经济转型困难、进驻企业良莠不齐和社会保障不足等。因此, 未来霍尔果斯口岸的发展需要立足地方客观实际, 制定适合本地的发展策略, 实现从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的转变。认真甄别和筛选前来落户的各类企业, 严格把控企业入驻门槛。根据当地供需情况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同时积极调动和鼓励社会大众广泛参与口岸建设, 共同推动边境口岸的有序、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5.2 讨论

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方法, 通过行动者构成识别、转译过程和行动者网络构建, 探究中国、哈萨克斯坦边境具有代表性的霍尔果斯边境口岸空间转型发展过程与机制, 并可识别边境口岸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路径^[29-30]。

哈萨克斯坦受全球油价下跌和国内需求疲软的影响致使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因此, 哈萨克斯坦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举措以应对经济困境。在此背景下, 哈萨克斯坦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合作,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以争取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霍尔果斯口岸行动者网络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哈萨克斯坦两国地缘政治经济合作的深化和加强。这可为研究区域未来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打造全方位合作平台提供依据, 也为其他边境口岸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背景下的高质量发展及其高效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参考。

未来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第一, 众多行动者被置于一个庞大网络中, 造成行动者网络的复杂化或无边际化。因此, 甄别和厘清主要行动者及空间实践是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前提, 同时也要关注其他各类异质行动者。第二, 行动者网络是动态演化的, 因此需要关注行动者的角色、目标和策略的转变, 这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发展局势具有至关重要作用。第三, 由于地理区位条件、地缘政治经济局势和社会文化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差异, 边境口岸在发展背景、演化过程和功能定位等多方面均存在着差异。因此, 未来将进一步对比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的边境口岸的空间转型过程和行动者网络变化。以期为新时期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和国家(地区)间跨境合作空间的塑造提供参考。

致谢: 感谢评审专家对本研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感谢首届世界地理大会分会场“亚洲政治地理思想与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点评专家给予的悉心指导, 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刘卫东, 宋周莺, 刘志高, 等. “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进展[J]. 地理学报, 2018, 73(4): 620-636. [Liu Weidong, Song Zhouying, Liu Zhigao et al.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4): 620-636.]
- [2] 刘卫东, M Dunford, 高波阳. “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建构——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包容性全球化[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11): 1321-1331. [Liu Weidong, M Dunford, Gao Boyang.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neoliberal to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7, 36(11): 1321-1331.]
- [3] 刘卫东. “一带一路”倡议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5): 538-544. [Liu Weidong.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 China and related research theme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 34(5): 538-544.]
- [4] 邓玉函, 秦红增, 陈子华. 跨境民族走廊新视野: 口岸人类学初探[J]. 社会科学战线, 2018, 282(12): 20-27. [Deng Yuhan, Qin Hongzeng, Chen Zihua. New vision of cross-border ethnic corridor: A preliminary study of port anthropology. *Social Science Front*, 2018, 282(12): 20-27.]
- [5] 倪天麒, 杜宏茹, 曹建标, 等. 外向型经济对城镇职能的作用响应研究——以天山北坡经济带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0, 24(12): 15-21. [Ni Tianqi, Du Hongru, Cao Jianbiao. Response of the export-oriented economy to the urban function—A case of the economic Belt on the northern slope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0, 24(12): 15-21.]
- [6] 秦军, 钟源, 熊耀平, 等. 边境区域协同发展规划策略与实践[J]. 规划师, 2018, 34(7): 59-64. [Qin Jun, Zhong Yuan, Xiong Yaop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lanning strategies of border area. *Planners*, 2018, 34(7): 59-64.]
- [7] 张强. 面向区域协同的边境城镇更新框架与策略——以凭祥市浦寨边贸区为例[J]. 规划师, 2019, 35(20): 19-25. [Zhang Qiang. Border towns renewal framework and strategy for portal area collaboration: Puzhai Border Trade Zone, Pinxiang City. *Planners*, 2019, 35(20): 19-25.]
- [8] Holifield R. Actor-network theory as a critical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justice: A case against synthesis with urban political ecology[J]. *Antipode*, 2009, 41(4): 637-658.
- [9] Sheehan R. Actor-network theory as a reflexive tool: (inter) Personal relations and relationships in the research process[J]. *Area*, 2011, 43(3): 336-342.
- [10] Shelton T. Urban assemblages: How actor-network theory changes urban studies[J]. *Urban Geography*, 2013, 34(4): 575-576.
- [11] Herod A. Scale: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M]. London: SAGE

- Publications, 2003: 234.
- [12] 杨忍, 徐茜, 周敬东, 等.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逢简村传统村落空间转型机制解析[J]. 地理科学, 2018, 38(11): 1817-1827. [Yang Ren, Xu Qian, Zhou Jingdong et al. Mechanism of rural space transformation in Fengjian ancient village of Shunde district, Foshan based on the actor network.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11): 1817-1827.]
- [13] 陈燕纯, 杨忍, 王敏. 基于行动者网络和共享经济视角的乡村民宿发展及空间重构——以深圳官湖村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718-730. [Chen Yanchun, Yang Ren, Wang Min.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ral homestay tourism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with the actor-network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red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Guanhu Village in Shenzhen.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5): 718-730.]
- [14] 胡晓亮, 李红波, 张小林, 等. 发达地区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与机制解析——以苏州市西巷村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1): 171-182. [Hu Xiaoliang, Li Hongbo, Zhang Xiaolin et al.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h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 in developed areas: A case study of Xixiang Village in Suzhou Cit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1): 171-182.]
- [15] 梅琳, 薛德升, Frauke Kraas. 跨国机构与地方共同作用下的城市全球化——德国波恩的案例研究[J]. 地理学报, 2014, 69(2): 156-168. [Mei Lin, Xue Desheng, Frauke Kraas et al. Urban internationalization under joint actions of trans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locals: The case study of Bonn, German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2): 156-168.]
- [16] 李鹏, 张小敏, 陈慧. 行动者网络视域下世界遗产地的空间生产——以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J]. 热带地理, 2014, 34(4): 429-437. [Li Peng, Zhang Xiaomin, Chen Hui. Production of world heritage based on actor network theory: A case study of Kaiping Diaolou and village in Guangdong. *Tropical Geography*, 2014, 34(4): 429-437.]
- [17] 郑辽吉. 丹东边境旅游产品创新与联合开发——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观点[J]. 世界地理研究, 2009, 18(2): 128-134. [Zheng Liaoji. Border tourism innovation: From actor-network perspective.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09, 18(2): 128-134.]
- [18] 钱俊希, 安宁. 全球文化转变的理论背景与方法论框架——兼论中国文化的跨国实践[J]. 地理研究, 2021, 40(11): 3103-3117. [Qian Junxi, An Ning. Theoretical contexts and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global cultural shift: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Transnational cultural practice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 40(11): 3103-3117.]
- [19] 王丰龙, 刘云刚. 尺度概念的演化与尺度的本质: 基于二次抽象的尺度认识论[J]. 人文地理, 2015, 30(1): 9-15. [Wang Fenglong, Liu Yunga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cale based on second abstraction. *Human Geography*, 2015, 30(1): 9-15.]
- [20] 张丽君, 王飞, 田东霞, 等. 中国跨境经济合作区进展报告(2018)[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9. [Zhang Lijun, Wang Fei, Tian Dongxia et al. Report on cross-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s of China (2018). Beijing: Economic Press China, 2019.]
- [21] 冯亚斌, 高志刚. 构造新疆外向型经济增长极的思考——清水河-霍尔果斯口岸经济特区构想[J]. 干旱区地理, 1998, 16(3): 19-24. [Feng Yabin, Gao Zhigang. Structure export-oriented growth pole of Xinjiang—Idea of Qingshuihe-Horgos port special economy zone. *Arid Land Geography*, 1998, 16(3): 19-24.]
- [22] 王富忠. “一带一路”背景下边境口岸城市对地区发展的带动作用——以阿拉山口市与霍尔果斯市为例[J]. 开发研究, 2019, 202(3): 95-99. [Wang Fuzhong. On the driving effect of border port cit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border are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Taking the cities of Alashankou and Khorgas for example.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2019, 202(3): 95-99.]
- [23] Mueller M. Assemblages and actor-networks: Rethinking socio-material power, politics and space[J]. *Geography Compass*, 2015, 9(1): 27-41.
- [24] Simandan D. Competition, contingency, and destabilization in urban assemblages and actor-networks[J]. *Urban Geography*, 2018, 39(5): 655-666.
- [25] Park K, Park S, Lee J. Analysis of a spatial net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or-network theo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20, 22(5): 653-665.
- [26] 霍尔果斯口岸管委会. 大漠口岸显风流——霍尔果斯口岸城建发展纪实[J]. 中国城市经济, 1999, 1(2): 3-5.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of Horgos Port. The desert port shows the wind-Horgos port city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record. *China Urban Economy*, 1999, 1(2): 3-5.]
- [27] 王雅静. 对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协调管理机制建设的思考[J].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 1998, 193(3): 19-24. [Wang Yajing. Reflec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ordinat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China-Kazakhstan Khorgos International Border Cooperation. *Journal of Eurasian Economy*, 1998, 193(3): 19-24.]
- [28] 刘宣, 王小依. 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人文地理领域应用研究述评[J].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2(7): 1139-11471. [Liu Xuan, Wang Xiaoyi. A review on the application of actor network theory to human geograph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3, 32(7): 1139-11471.]
- [29] 艾少伟, 苗长虹. 从“地方空间”“流动空间”到“行动者网络空间”: ANT视角[J]. 人文地理, 2010, 25(2): 43-49. [Ai Shaowei, Miao Changhong. “Space of places”, “space of flows” and “space of actor-net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 *Human Geography*, 2010, 25(2): 43-49.]
- [30] 袁超, 陈品宇, 孔翔, 等.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人文地理学的交互关系研究——重构、争辩与反思[J]. 地理研究, 2021, 40(2): 583-596. [Yuan Chao, Chen Pinyu, Kong Xiang et al.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human geography: Reconstruction, debate and reflec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 40(2): 583-596.]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Khorgos border po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or-Network Theory

Wang Bin¹, Sun Ao^{2,3}, Liu Yungang^{2,3}, Wu Dianting⁴

(1.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Jiangsu,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 The Center for Asian Geographical Studie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3. The Center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Spatial Governa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4.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border ports has become one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facing the country.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border ports is the result of multi-subject and multi-scale integ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epening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However,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on the spatial practice of border ports with diverse and heterogeneous subjects in the new period. Given this, this study selects Khorgos Port as a typical sample and uses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to analyze its spati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This study mainly adopts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of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in-depth interview, and discourse analysis to obtain first-hand data, and obtains the required data through data collation and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multiple and heterogeneous actors are connected around the common goal of the stage under the premise of pursuing their interests, thu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border port actor network. 2) In the new period, the composition, intention and goal of border port actors have changed, and the network of actors has changed from a loose state to a tight state. Political power subjects mobilize market capital and social mass forces to participate in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order port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 border ports and their effective connection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network of actors, it is found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diverse and heterogeneous subjec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Khorgos Port also brings many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which should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s and management agencies at all levels,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orderly,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order port by mobilizing force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e change in the network of actors at the Khorgos port reflects the deepening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Kazakhstan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study of the region to build an all-round cooperation platform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n the future, and als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other border port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tyl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ir efficient docking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future,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and actor network changes of border ports in different regions, different stages, and different types will be further compar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new era and the shaping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space among countries.

Key words: border port;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ctor-Network Theory; Khorgos